



自从去年妹夫给我妈家装了一个摄像头后,我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她老人家了。

这感觉真好。虽然对我妈来说,好像有点不公平,因为她的隐私全没了,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理解我们做儿女的心情,正好也解决了她之前老说家里东西不见了,担心是阿姨拿走的一块心病(我和妹妹都严重怀疑是她自己健忘找不着)。妈妈一人独居,与妹妹家只隔一条马路,她一生热爱自由,不喜欢与我们晚辈同住。她对我说过,老年人与你们生活习惯不同,住一起时间长了怕有矛盾,我如果和两个女儿闹翻了倒没有什么,你们反正是我亲生的不记仇,万一和女婿处不好事情就难办了。她有她的隐忧。

摄像头的位置正对着客厅,可以顺便看到厨房与洗手间间的门,以及在里面活动的身影,只有两个房间看不到。但我想看的不是这些吗?妈妈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关灯睡觉的。她出门了没有,阿姨今天帮她做了几道菜。甚至有好几次,我听出来电视里唱的是京剧里的哪出戏,追的是哪个剧,或者是哪位歌手唱的歌。我觉得我妈平时的文娛生活虽然靠电视机略显单调,但电视机比她的女儿作用大,因为女儿不能时时陪伴她。

在监控里看到妈妈的感觉很有意思,也许我们应该早就装一只了。比如,她经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歪头睡着了,我就会对着摄像头喊:“老妈,别受凉了,快盖个毛毯。”妈妈听到我在喊她,就醒了,还欲盖弥彰地辩解,没睡着没睡着。有时,看她走来走去地忙碌着,动作明显比从前迟缓,就大喊几声“老妈”。她就凑到摄像头跟前,好像看见我在里面似的,一脸惊喜,笑眯眯地问,这回家我大姑娘吧?镜头里略有放大变形的妈妈,像个欢乐喜剧人,看得我哈哈大笑,我笑她也笑。这种时候很多,因为我和妈妈都乐此不疲。我越来越觉得,虽然没有爸爸可喊了,但随时有妈妈可见,可喊,对我来说,是天下最快乐幸福的事之一。

生活不可能总是甜的。中年来自身体的压力,大城市生活的压力,疫情的反复,会让我的灵魂有时惶恐不安,情绪走低。这个时候,我就打开摄像头,只要看见我妈的身影,心就能马上平静下来。也许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两个灵魂,一个垂头丧气,一个热气腾腾。这两个灵魂此消彼长,一直在较劲,但他们都需要一个出口。有人说他负面情绪一上来就去运动,有人说她会去买买买,有人选择吃甜食。我呢,是看我妈,换句话而言,宇宙的尽头是监控里的妈妈。反正负面情绪一旦有了去处,丧气的灵魂就逃走了,热气腾腾的灵魂会过来拥抱你。

罗翔教授在延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时说:“很多时候,我们爱的是整个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而真正的爱应当是对具体个体的爱。”“我们要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他说得太好了。有位文友告诉我,她把八十多岁、腿脚不便的老妈接到自己家里照顾了,虽然每天服侍妈妈很辛苦,但是她的内心特别安宁。因为她知道自己做得对,不想等到有一天,妈妈不在了,再后悔。她说最喜欢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秉昆,因为他的善良怜悯和重情重义。

父母一天天肉眼可见地老去,我们也在变老,而爱是对抗岁月的唯一法宝。

著名作家路遥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我保存了38年,其间搬了七次家,扔了很多东西,但路遥的信我一直保存得好好的,因为那是我年轻时的梦。

父亲年轻时,曾在《大公报》《申报》及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等,他最常用的笔名是“东方蒙”。母亲生我后,父亲将其笔名中的“蒙”字,“赐”给我作了乳名。可能是受父亲的遗传,

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就比其他同学要写得通顺一点,花里胡哨的形容词和成语,用得也比其他同学多一点。因此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或在课堂上宣读,或在教室墙上张贴,弄得我忘乎所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小说、散文向省内外报刊投稿。但投出的稿件,要么是石沉大海,要么是就是退稿。失望之余,我写了一则小稿寄给《文汇报》。没想到这篇“诉苦”稿却被编辑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可能是报社觉得类似我这样遭遇,在许多文学青年中都会发生,觉得有必要关注和回应一下?稿件见报没多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无锡的信,那是在1983年11月中旬。打开一看,是路遥写来的,寥寥数语。路遥开门见山地让我寄一两篇习作给他,他说要帮我在文学之路迈出第一步,使我有信

心、有勇气、有决心在今后坚持不懈地搞创作。信末,还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面对这意外之喜,我却胆怯了。因为路遥的名气实在太,大得使我不敢去惊扰他。最终我没有遵命将习作寄给路遥,失去了一个机会。但我还是很感激他,能收到他充满关怀的信,对当时我这个20多岁的文学青年来说,其激励作用不言而喻。

以后的日子,我调整了心态,不再过于为作品是否录用而纠结。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几篇散文、诗歌、寓言等作品,有一篇散文被编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和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留学生教材《说中国话 看中国人》一书,另有一篇在参加一家国家级杂志征文得了三等奖,奖品是10个憨态可掬的熊娃娃,妻子至今保存得完好如初。再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的写作内容也有了变化,以写法学文章或故事为主,一度在《新民晚报》一个专栏上,连续发表办案手记,上海的同行还误以为我在上海工作呢。

能取得以上些微成绩,我想与路遥的信也有相当关系。将尘封38年的这段往事写出来,是因为我垂垂老矣,不想让路遥的善举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监控里的妈妈

梅莉



边看边聊

愿做报春老梅树

刘心武

六十年前,1962年春节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赏梅迎春》一文。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不认识《中国青年报》社的任何人士,是自发投稿,《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从众多来稿中选出我这篇,二审通过,总编辑签发,还安排在副刊头题,配了一张挺大的图。文章里我侃侃而谈,似乎对梅花梅树梅子都很了解,还向读者报告:那一时期,梅树只生长在中国,日本曾多番尝试种植,总未成功,而在我国,梅树主要生长在江南,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超山、无锡的梅园“香雪海”,都是以栽梅出名的胜地,每逢春梅盛开时,人们就络绎不绝地相携去赏梅。迎春赏梅,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文化习俗。

其实写文章的时候,我并未去过江南,我所定居的北京,那时候还没有地栽梅,我所赏的梅,都是比如说中山公园塘花坞里的那种盆景梅。那么我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除了从盆景梅去想象江南地栽梅,就是通过阅读。从少年时期,我就喜欢读书,我的生活历程,是现实的阳光雨露坎坷颠簸柳暗花明,与读各种书籍从中获得知识启发激励教训,交织一起,相浸相融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甲子过去,祖国变得更富更强更美了。北方难以地栽梅花的困难,在上世纪80年代后,经过园林栽培专家和园林工人们的一再努力,已经突破。现在在北京人赏梅,不用非去江南,不必只在盆景梅前凝神,许多地方,都有梅林出现。前些年,助理焦金木开车,我们一起去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那敞开式公园的园林布局,主打就是地栽梅,有红梅、白梅,还有绿萼梅。那日天气晴好,游客不多,防疫都戴着口罩,保持距离,静静地赏梅。我逐次走近不同的梅树,近观那美丽的花朵,嗅其淡雅的香气,品其独特的神韵,身心大畅。不禁就回想起六十年前,自己发表过《赏梅迎春》的文章,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如今却人耄耋之年。

“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批评原壤的话,孔子说的活收齐全是:“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就是这个原壤年轻的时候不尊老爱幼,成年后又无所事事,现在老不死,成偷取岁月的贼了。孔子和原壤本是朋友,他骂原壤“老不死的”,既是批评,也有调侃之意。当下尊老爱幼风气很盛,少有人嫌弃耄耋老人视为贼寇的。但我自己既然进入了“八〇”后,就应自减:不能像原壤那样无所作为,倚老卖老。就如一株老梅树,只要精气神还在,就该再开出花朵,对社会,对年轻一代,有所奉献。我现在仍在写作,仍在参与当下的文化活动,不仅电脑打字,也录制音频,写新的小说,也把自己几十年来的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提炼出来,出版新的散文随笔集子。

愿自己这株老梅,还能继续报春。

2022年早春二月 (此文系天地出版社《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之序)



梅花图

这些天,既平凡又突然。其实,天还是以前的天,“倒春寒”在上海也常常见,但一向淡定有“腔调”的老弄堂上海人感受又如何?

先生是医生,要冲在防疫第一线,我即当老妈又当老师,但还是想方设法“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并不宽敞的石库门里发扬老上海人的精神:阳台门前天井里,种种花养草治愈焦虑,美好春天就在身边。抗击疫情自给自足,教孩子宅家发豆芽,既孩子科学实践,又解决了吃蔬菜问题。正好在疫情中教育孩子勇敢面对困难,学会自助助人,互帮互助!

老石库门的上海人“拎得清”。前两天天下大雨,大家排队做核酸,居委会的志愿者跑前忙后,到了晚上,嗓子全沙哑了。“承兴里”是有名的体育弄,居委会魏主任亲自上门送体育器材给“老家”的孩子们,鼓励孩子们积极锻炼身体,战胜新冠小怪兽。

扶着250度的近视镜,用睥睨众生的语气向我等凡夫俗子宣判:我这儿有一个上联,押一百块,看你们谁能对出下联。

赤橙黄绿青蓝紫,以色列。一阵面面相觑。躲父亲身后狐假虎威的我探出了头,冲着这帮比我大上七八岁的痞子嚷道:“这有啥难的?你真是个大笨蛋,汝南城(汝难成)。都是河南汝南人氏,脱口而出的就是故乡。幸亏这是我的地盘,不然我估计会被康辰老哥当陀螺抽。那年,康辰还是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也许是夜太黑,太冷,康辰忍不住点了把火,爱情的炬火。

一掉困在脑海里二年的“绝对”终于想出了下联。之所以是“一掉”,因为它像一艘飘忽不定的船,多半时候隐没,不时忽而泛起,晃了两个圈又缩回去,留一尾余波荡在我的脑皮层。

上联:赤橙黄绿青蓝紫,以色列;下联:日月木金水火土,周星驰。虽不算工对,但亦足以告慰这十几年里死去的脑细胞了。

细思一番,二年前我邂逅这一上联,也是在孟夏时节。家父的几个学生正课间休息,都是高二的学生,正张扬的年纪,高考虽然近在咫尺,但并不足以把他们的生气钉在书桌上的。一个叫康辰的男孩子

冠小怪兽。历经磨难的“魔都”人早就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正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说:“上海之所以叫魔都,就是他总能化解掉各种各样的难题,在打怪中能够升级!”关键时刻,人人要学会心理自救。上海唱作人王渊超最接地气的《蛤蚧炖蛋》新鲜出炉,他用熟悉的上海话告诉人们,要耐心地“隔离等待”。小提琴十级的儿子马上喜欢上了这首歌,从小立志学医的他正准备周末去居委会做小志愿者,于是照谱子拉唱出来,改编成《弄堂抗疫进行曲》,鼓舞小伙伴们共同抗疫!

你安好,我无恙。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你我。上海人明白,生命最珍贵,健康排第一。困难面前,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上海的石库门,上海的老弄堂,体现上海人精神力量的地方。可敬的上海人,抗疫进行中!

弄堂抗疫进行曲

居平

扶着250度的近视镜,用睥睨众生的语气向我等凡夫俗子宣判:我这儿有一个上联,押一百块,看你们谁能对出下联。赤橙黄绿青蓝紫,以色列。一阵面面相觑。躲父亲身后狐假虎威的我探出了头,冲着这帮比我大上七八岁的痞子嚷道:“这有啥难的?你真是个大笨蛋,汝南城(汝难成)。都是河南汝南人氏,脱口而出的就是故乡。幸亏这是我的地盘,不然我估计会被康辰老哥当陀螺抽。那年,康辰还是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也许是夜太黑,太冷,康辰忍不住点了把火,爱情的炬火。



夜光杯

不过这火光绚丽绽放之后,便在凛风中晃曳枯萎。那年高考,康辰不出意料地落榜了。一个月后,公共操场露天电影,我在草坪上看到康辰寥落的身影。那部电影叫《大话西游》。日月木金水火土,周星驰。二年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下联里,不知算不算天意从来高难测。第二年,复读一载之后,康辰去了南方一所不错的大学。之后,我们再无交集。我那年刚开始学诗,十二年间,诗艺未成,反倒断了三次胳膊,几乎改名叫杨过。持家但有四立壁,治国不靳三折肱。黄山谷的遗馥,不幸有我做到了。都是青春。算来,康辰现在也早过了而立之年,应该也做了父亲,也奔忙在命途的茫茫大荒里。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康辰老哥,一轮生肖转过去了,兄弟我终于对出了你的上联,那一百块,该给我了吧?

七夕会 孩子兴奋地说:“爷爷,晚上天空我看了,不是漆黑的,而是灰色的,月亮周围有点亮,是浅灰色的,但不是蓝色的。”我想了想说:“你的观察很仔细。不过等你长大了,你会慢慢理解叶老为什么会写成‘蓝蓝的天。’”我把此事告诉陆老师,我说:“叶老那首诗写于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没有污染,也许月亮周围的天空会有点蓝。”陆老师也很感慨,说:“其实天空是什么颜色,现在已不重要了,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对他自己不理解问题能提出质疑,通过自己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见解,就算这种见解是错的也没什么,但这种学习态度不是我们对学生的希望吗?”第二天语文课,陆老师特意留出半节课时间,让小烨上台讲他观察天空的情况,并奖励他一朵“学习积极分子”的小红花。



冲刺

陈志刚 摄影

孙子小烨读一年级了,我以前学过汉语言文学专业,自以为辅导他一年级语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一天,孙子拿着课本来找我,说:“爷爷,书里写错了。”我一看是叶圣陶先生的一首儿歌:

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首儿歌,我上小学一年级也读过,是几代人都学过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儿歌。孩子说:“课文中的小孩能够看到星星和月亮,时间一定是在晚上。晚上的天空应该是漆黑的,他怎么还能看到蓝蓝的天呢?这不是写错了?”我听了愣愣,就跟他讲,这是作者浪漫主义的写法,作者带有想象,因为小孩坐在月亮上非常兴奋,所以看出来的是蓝蓝的。但一年级的孙子以为为:“你见过晚上有蓝蓝的

天?”一口咬定书是错的。第二天放学,我去接他,在校门口碰到了教他语文的班主任陆老师。我把这个事情给老师说了,陆老师也笑了,“我教书20多年,一年级也轮回教了4届,第一次碰到提这样问题的学生。”她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好样的,老师现在也

天?”一口咬定书是错的。第二天放学,我去接他,在校门口碰到了教他语文的班主任陆老师。我把这个事情给老师说了,陆老师也笑了,“我教书20多年,一年级也轮回教了4届,第一次碰到提这样问题的学生。”她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好样的,老师现在也

夜空是蓝色的吗

姚胥贤

说不出什么,以后有机会晚上乘飞机,你可近距离观察一下,月亮旁的天空是不是黑色的。”翌日放学,小孩高兴地对我说:“今天语文课,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是个爱动脑筋好学生。”当年的寒假。孩子的妈妈带他去广州旅游,回来特意买了晚上有月亮的航班,让他看看有月亮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回到家里,

说不出什么,以后有机会晚上乘飞机,你可近距离观察一下,月亮旁的天空是不是黑色的。”翌日放学,小孩高兴地对我说:“今天语文课,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是个爱动脑筋好学生。”当年的寒假。孩子的妈妈带他去广州旅游,回来特意买了晚上有月亮的航班,让他看看有月亮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回到家里,

养育